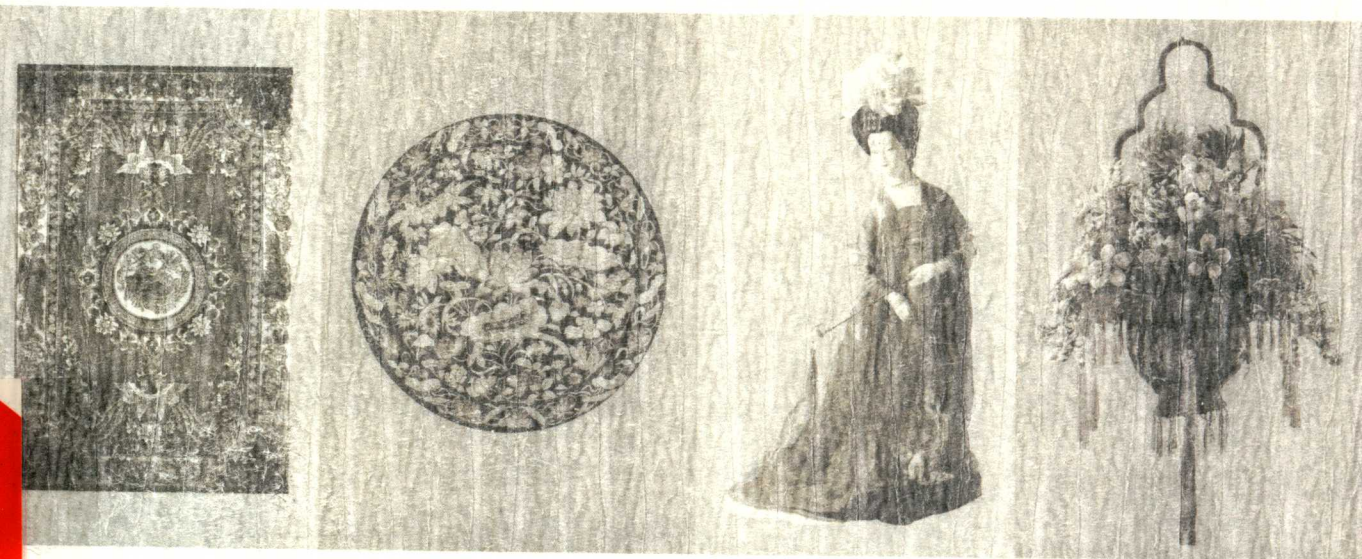


吴明娣 / 主编

百年京作

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 传承与保护

吴明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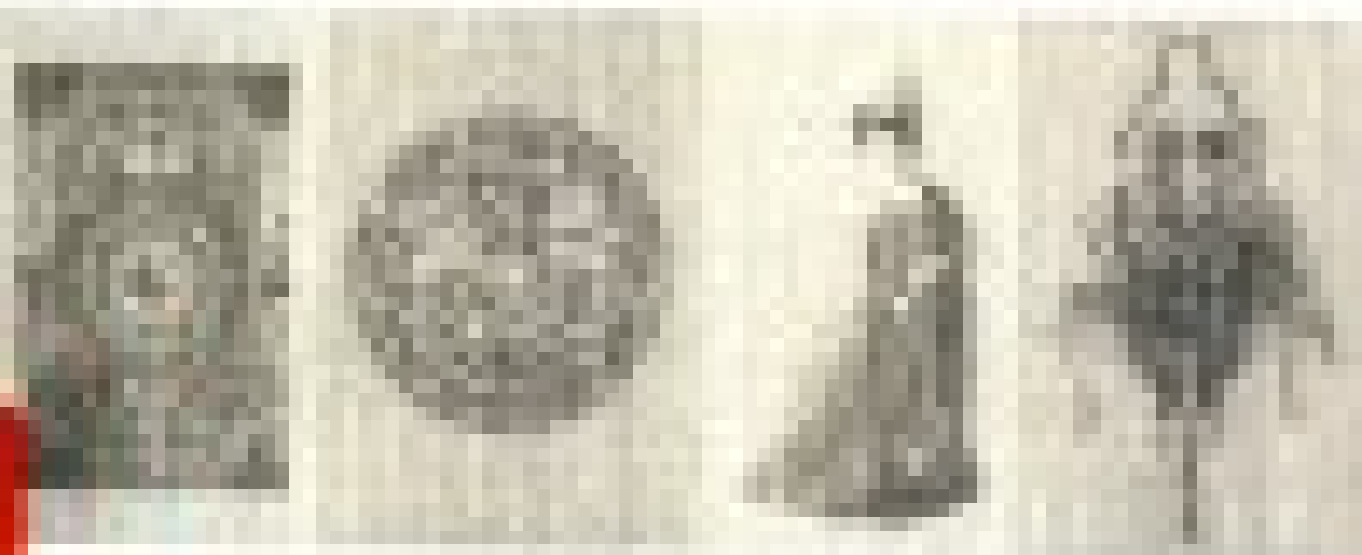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百年來

中國文學史

一



百年京作

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 传承与保护 下

吴明娣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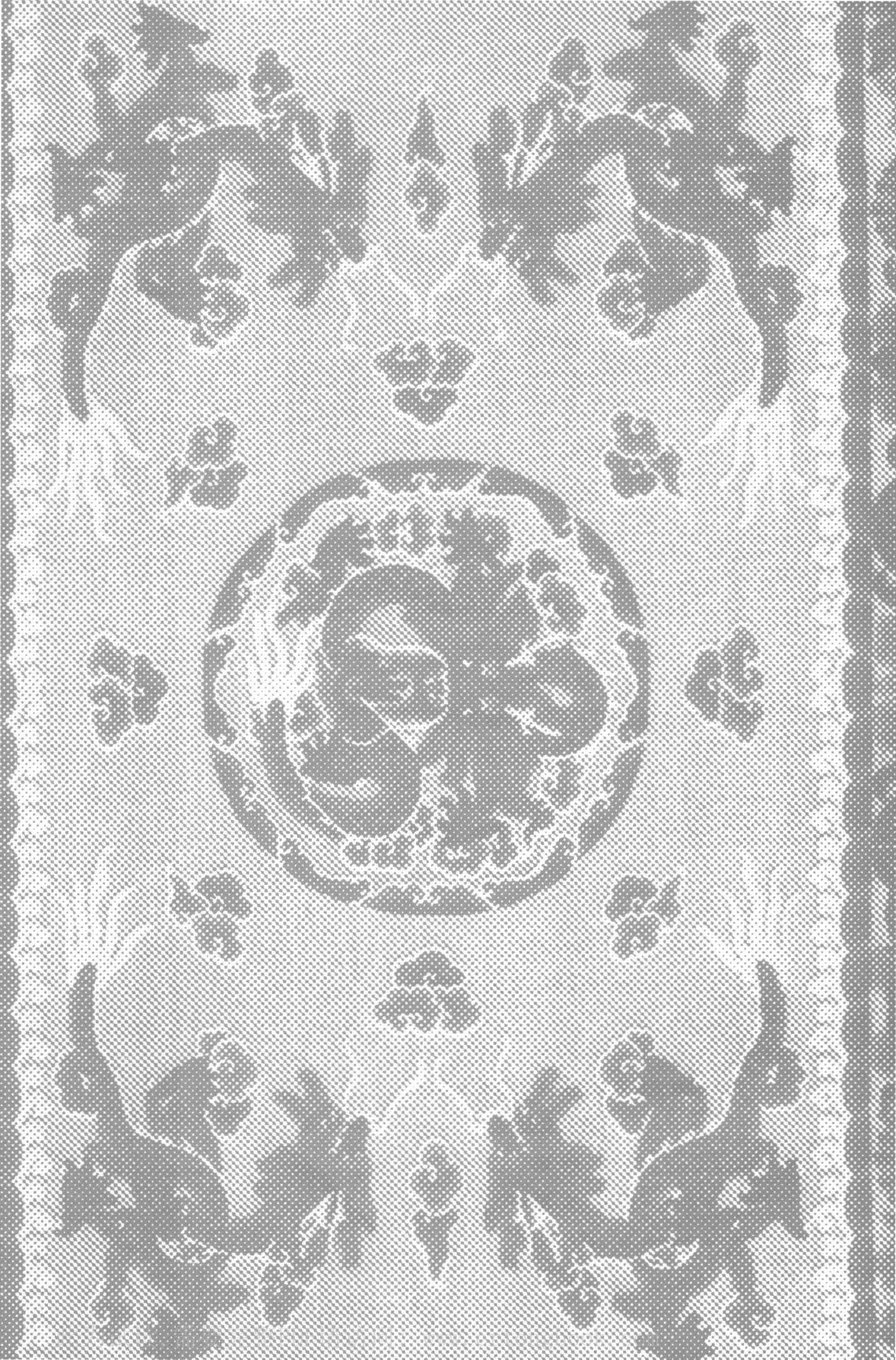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BaWY07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SZ201010028012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谨以此书献给为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作出贡献的前辈与同仁



下册

第九章

20 世纪北京地毯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319
-------------------	-----

第十章

20 世纪北京刺绣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349
-------------------	-----

第十一章

20 世纪北京绒花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387
-------------------	-----

第十二章

20 世纪北京绢花、绢人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403
----------------------	-----

第十三章

20 世纪北京料器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433
-------------------	-----

第十四章

20 世纪北京风筝、泥塑、面塑、鬃人等 民间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457
-----------------------------------	-----

第十五章

20 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教育	487
-----------------	-----

结 语	507
-----	-----

20 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大事记	528
------------------	-----

参考文献	577
------	-----

后 记	581
-----	-----

又 记	585
-----	-----

图片出处	587
------	-----

彩图	I
----	---

第九章

20 世纪北京地毯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北京地毯,专指北京地区生产的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传统手工织毯,以地毯为代表,也包括卧毯、挂毯及其他实用及装饰性织毯,是北京地区重要的传统工艺品之一。北京地毯在其装饰题材、布局、设色等方面特色鲜明,是“京式工艺”——“京样”的代表性品种,又被称作“京毯”。

北京地毯的历史可追溯至元代。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作为元大都的北京成为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蒙古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对毛织毡毯的需求使得地毯工艺在中原内地得到传播,北京成为元代羊毛地毯的重要产地和贸易中心,且宫内设有专门的织毯机构,以满足宫廷对织毯的需求。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北京地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分为不同的规格、档次。为宫廷织造的地毯从用料、加工到质量检验等最为考究,最能体现其拥有者身份地位的高贵,具有鲜明的宫廷工艺特点,因此被称作“宫毯”(图9-1)。宫廷对织毯的需求量大,除接受蒙藏、新疆、宁夏等地进贡的毛织毡毯外,还征调各地优秀工匠进京织造或命令各地官府依样定制。与此同时,北京民间织毯工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关于北京民间织毯的明确记载见于咸丰十年(1860年),有藏区喇嘛进京进贡了一批藏毯,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受到咸丰帝的赞赏,遂命藏区喇嘛敦尔尼玛带徒弟二人在京开办织毯作坊传艺。后来,两名徒弟又在北京南城广安门内报国寺设地毯传习所,招集贫寒子弟,教授地毯技术。

清代末期,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皇权衰落,外来势力更多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北京地毯由主要供宫廷及权贵阶层使用转向满足生产市场需求的产品,其服务对象主要为海外消费者;这些海外消费者对地毯的需求刺激带动了北京地毯业的发展。

20世纪,北京地毯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外贸需求量的增长息息相关,其供需关系、制作群体、营销模式等都不同于以往,基本上依靠出口外销来维系该行业的生存与发展,使得这



图9-1 故宫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处地毯

项传统工艺得以传承,并在特定阶段得到了政府、行业及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与保护。

一、1900~1948 年北京地毯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一) 行业概况

1900 年至 1911 年,北京地毯存在两种生产方式,一为传统的作坊式生产(图 9-2),二是在官方和民间开设的工艺局内所设立的地毯生产机构所进行的生产,带有集约化特征。前者较少见于文献记载,而后者从北京工艺局、农工商部工艺局的有关文献资料中能够了解到部分信息。据记载,当清王朝统治衰败之时,宫廷与民间地毯技艺各自寻求发展空间,原服务于宫廷的地毯工匠转而从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廷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实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其后,京城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毯作坊,这些地毯作坊都是由宫廷技师及传习所毕业的早期学徒创办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为了扩大地毯销路,清政府农工商部命令各地设立工艺局,北京成立了地毯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为缓解社会矛盾、安置灾民,清政府于北京南城广安门报国寺组织教习开办地毯传习机构,同时还开办刺绣、景泰蓝等技艺传习所。此外,“清末刑部主持设立的男童习艺也设有织毯一科,招收 8 岁到 16 岁的男童进入习艺所,学习、编制织毯。”¹这类传习所对北京地毯行业生产的规范化及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外来势力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的诸多层面,北京成为当时来华洋人的重要聚居区,洋人对地毯、刺绣等中国传统织绣技艺格外青睐,他们除收购地毯等工艺美术品外,还涉足地毯的生产与经营。如 1900 年,北京继长永地毯厂曾得到天津鲁麟洋行的德国商人的订货,并被运至德国首都展出,颇受赞誉,提高了北京地毯的知名度,订单不断。与此同时,北京永和公地毯厂也曾得美国新旗昌洋行的订货。同年,北京地毯还在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1902 年,黄思永、黄中慧开办的善后工艺局选送包括地毯在内的北京传统工艺品参加在越南河内举办的万国赛珍会,获头等文凭。1904 年北京地毯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1911 年,北京地毯在意大利都灵万国制造工艺博览会上获最优奖等。北京地毯在欧美国家赢得了较高声誉,也促使其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并在这一时期获得短暂的发展。但相对于北京景泰蓝、玉器、牙雕等传统手工艺,北京地毯在 20 世纪初期,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的社会知名度都无法与玉器、牙雕等相提并论。至 1910 年前后,北京只有继长永、继长恒、兴和等几家地毯厂和生产作坊,呈现出“营此业者,甚属寥寥”²的状况。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手工地毯的重要出口国土耳其和波斯深受战争影

1. 石瑞雪:《20 世纪初(1900-1937 年)西方艺术对中国京畿地区传统手工艺装饰的影响——以织毯工艺为例》,硕士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2. 姜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8 页,北京,北平市社会局铅印本,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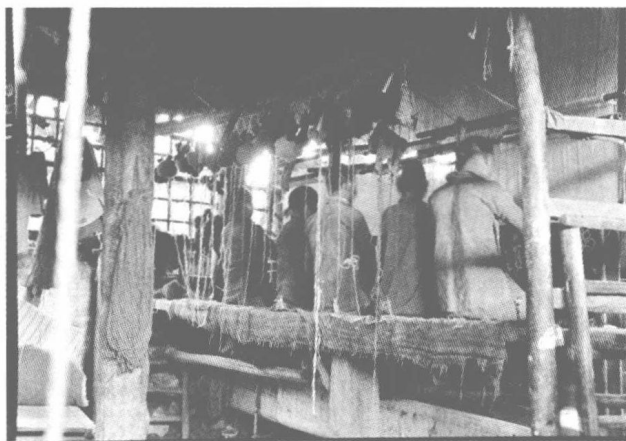


图 9-2 民国时期的地毯加工作坊

响,两国地毯出口量锐减,但北京地毯在 1914 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的优异表现,使得中国地毯成为欧美地区国家的购求对象,这给中国地毯的出口拓宽了门路。“地毯出口之数,渐渐上增。1915 年天津口岸出口地毯为 131792 海关两,1916 年则增加了 5.5 倍,达到 737994 海关两,较民国初年增加了 16 倍,说明这时北京地毯业已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比较稳定的份额。”¹ 1916 年,

北京地毯厂和作坊已达 220 家,地毯工人 7400 人,且出现了地毯行业商会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对地毯的需求量开始增加,北京地毯曾在短期内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促使北京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毯行。至 1920 年,北京的地毯厂、作坊增至 354 家³,地毯销量呈现不断上涨之势。据相关资料记载“外贸出口平均以每年增加 100 多万海关两的速度增长,1926 年出口价值达到了 6679107 海关两,是历史上出口价值最高的一年,较 1912 年增长了 146 倍,较 1920 年增长了 5.79 倍,这样的上升速度表明地毯业处在快速扩张的阶段。这一年,京津地毯出口量在中国手工业出口总额中占 2.4% 以上的份额。”⁴ 在这样的前提下,北京地毯行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得规模较大的地毯企业的建立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一些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工厂开始创办,如仁立、开源、燕京等。仁立地毯公司于 1920 年 5 月建立,由费兴仁联系留美学生集资开办,设有股东会、董事会。后来该公司得到中孚银行的投资,除在朝阳门内大街设总厂外,还先后在烧酒胡同、拐棒胡同、北锣鼓巷等处设立分厂。费兴仁留学美国时,对工厂管理制度做过一定的研究,因此地毯厂的管理相对规范,内部机构设置完备,与其他地毯厂形成鲜明对比。据在仁立地毯厂工作过的老艺人冯金茂⁵ 回忆,仁立地毯厂设有独立的科室,每个科室有专业技师。如他于 1930 年进入地毯厂后所在的图案室,有六七位设计人员,他们各有所长,所绘图案有所侧重,他还曾向图案室的设计师刘根宝请教如何画龙,并跟随其他师傅学习不同的画小样技能。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

1. 杨原:《近代北京地毯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04 页,2009(2)。

2. 地毯行业商会,成立于 1916 年,位于崇文门外东花市。参见北京市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工业卷·纺织工业志·工艺美术志》,401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3. 北京市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工业卷·纺织工业志·工艺美术志》,401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4. 杨原:《近代北京地毯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05 页,2009(2)。

5. 冯金茂,生于 1907 年,河北省河间县人。1920 年,时年 13 岁的冯金茂及其胞弟进了天津“三升”地毯厂当学徒,在这里织了 5 年地毯。1925 年,三升地毯厂倒闭后,冯来到天津养济毯厂。在这里,他跟随一位叫做崔永生的师傅开始接触设计(学习放大样)。1930 年,在业内小有名气的他进入了北京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图案室当放样的技术人员。

上带动了北京地毯业的发展并使其步入正轨,对北京地毯的传承与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为提高产品质量,仁立地毯厂在1931年添置机器设备,采用机器纺线织造地毯。像仁立地毯厂这样建立董事会、向银行贷款、规模经营、自营出口业务、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等方式,是北京传统地毯业所不具备的,这对于北京地毯行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手工艺行业由传统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由零散加工走向集约生产。

开源呢绒地毯工厂成立于1917年,主要生产地毯和床毯,能自主经营出口业务。与仁立地毯厂的状况相类似,其总经理罗绰裕为留美、留英专修纺织染的学生,因此该厂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还有一套规范的加工程序,不仅使地毯的生产效率大为提升,更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为该厂的外销产品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燕京地毯厂最初由美国女传教士海伦·菲特(Helen Fette)为了资助正处于饥荒中的北方地区而发起的,她组织部分生产者从事地毯生产,获得的效益多用于慈善事业,使部分群众有了衣食来源,缓解了饥荒压力。此后,她与北京地毯商李梦舒合作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北京燕京地毯厂,成为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地毯出口商。¹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外来文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步加深,原本生活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满、蒙等少数民族权贵随着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的下降,对地毯的需求也大大减弱。新兴的权贵更因受到外来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地毯等传统工艺品的需求十分有限,这导致地毯在国内的销售量逐步下降。

但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却出现了一些由外资控制的规模较大的地毯行。这类企业资本雄厚,机器设备较为先进,产品又可直销国外,因此,这些外资毯行成为这一时期北京地毯生产的主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燕京地毯厂和万成永地毯厂。1921年,美国人费特尔借助花旗银行资本对燕京地毯厂进行投资,使该厂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厂发展到了拥有6个分厂、1200多个工徒的大厂,还在总布胡同设立费特尔公司,专门收购地毯。同时,还有70多个小厂,500~600人为该厂做外加工,控制了北京地毯生产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该厂还控制和操纵羊毛市场,进一步加强了对北京地毯市场的控制。美国商人舒美克也是控制北京地毯厂的主要商人之一,他曾投资万成永地毯厂,并控制部分小型地毯厂为自己直接加工地毯以供出口,从中获取利益,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北京地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得以维持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传统的以家庭手工生产为主的小地毯作坊,基本成为大地毯厂的来料加工点。此外,外资地毯厂中也有部分是基督教教会开办的,这类地毯厂既有收养游民、扶危济困的功能,又能够为教会带来经济效益。

民国前期,北京除了有数百家地毯厂外,还存在地毯行会。³这表明北京地毯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已经趋向规模化、规范化,这为北京地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 石瑞雪:《20世纪初(1900-1937年)西方艺术对中国京畿地区传统手工艺装饰的影响——以织毯工艺为例》,硕士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2. 杨原:《中国近代地毯业》,7页,硕士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3. 据王季点,薛正清:《调查北京工厂报告》记载“在学徒期满后,地毯行业主会发放1~2元的额外补助”。

自1927年起到1934年,北京地毯出口量显著减少,这要归因于波斯、土耳其的地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生产,成为北京地毯的国际首要竞争者。同时,作为北京地毯主要出口国之一的美国又在20世纪20年代末实行了关税壁垒政策,以减少中国低等地毯的输入,这一措施,使得外销美国的地毯数量大幅减少。

北京地毯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当时的地毯厂设备落后,多为过去的木制织毯机,且大部分地毯的加工为家庭手工劳动模式,生产效率低下。部分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让童工和学徒投入生产,使用假冒伪劣染料,降低了产品的质量,严重影响了北京地毯的声誉。第二,地毯花样单调,缺少创新,多为仿古式。第三,地毯颜色少,染色方法陈旧,制成地毯容易掉色,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第四,行业竞争不当。当时的民营地毯厂、作坊生产的地毯一般通过洋行转销国外,在转销过程中,经过层层克扣,厂商所得利润只是洋行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到手工业者手中则所剩无几,这种情况造成当时北京地毯业发展的不平衡。第五,工人待遇低,生产、生活环境恶劣。20世纪20年代,北京多数地毯厂的厂房面积小,厂内封闭阴暗,致使很多工人在混乱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患病,如沙眼、肺病等。且工人待遇极低,难以过活,甚至出现罢工,导致北京地毯业工厂、作坊的从业人员数量及产量显著减少。193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平地毯厂有220家,工徒7400多人,年地毯生产量约20多万平方米。在这些厂中,以燕京、仁立、开源、振东四个厂最大,他们控制着北平地毯产量的一半以上。到1934年,北平地毯工人只有2300人,到1936年仅有1700余人,是1929年的23%。”¹

抗日战争时期,传统工艺美术的生产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基本上处于衰败状态,但仍维持一定的规模。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政府成立了“皮毛株式会社”,羊毛的进出被该社控制,成为军用品,致使北平地毯业缺乏原料供给,大批工厂倒闭,遭到沉重的打击。此外,部分外资地毯厂还通过操控羊毛市场,对北平地毯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垄断,北平民营地毯厂、作坊的生产每况愈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运遭封锁,以欧美消费者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地毯出口受阻,北平大部分地毯厂停产、倒闭。“地毯1939年之前年生产约百万平方尺,1946年减至9万平方尺,不足战前的1/10。”²抗日战争结束后,北平专门从事地毯生产的企业仅剩26家,工徒358人,与抗战前繁荣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颓败的形势下,也存在着例外,这主要源自于欧美商人的投资,使得北京地毯的生产在短期内有所复苏。在外资干预下,至1948年,北平地毯业虽略有恢复,达到工厂54家、工徒990人,但好景不长,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由于政局动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关税繁重,北京地毯业再次出现了工厂倒闭现象。这种状况的出现,使

1. 北京市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工业卷·纺织工业志·工艺美术志》,40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2. 《当代北京工业丛书》编辑部:《当代北京工艺美术》,23页,北京,北京日报出版,1989。

地毯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再度受到重创。但如燕京地毯厂等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仍在勉力支撑,维系着北京地毯业的生存,但已无法达到战前的水平,直至和平解放后,地毯业才重获新生。

(二) 传承

北京地毯工艺因编织方法、用料等方面存在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丰富。如前述咸丰十年进京的西藏喇嘛敦尔尼玛所带的两名徒弟曾在北京南城广安门内报国寺设地毯教习所,招集贫寒子弟,教授地毯技术,因两人传授的地毯编织方法有别,遂以“二人在报国寺出入分东西两门”为依据将其分为东门派、西门派。东门派主要集中在南城、崇文一带织造地毯,偏重于织造薄型毡毯和仿旧毡毯。东门派喜用圆刀,而且一般不用剪刀加工,织造完成后再用槐树水或者烟锅子水做旧,制成仿旧地毯。这种类型的产品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售价往往高于普通地毯。西门派多聚集在北城加工毡毯,偏重使用方刀,擅长织造厚型毡毯和“活头活儿”¹。

北方的地毯技艺于清末民国时期传至京师。据记载,来自绥远²的地毯工匠也在北京传授地毯技艺,与上述东门派、西门派相比,师从于绥远地毯艺人的学徒数量相对较少,这部分地毯工匠被称为“吉门派”³。该门派的地毯在编织时,既用圆刀也用方刀,没有固定的样式,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为上述两派所排斥。这种门派之别在此后的北京地毯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中得以延续。

旧时代的地毯业属于纯手工业,所有用具、材料及制作过程都完全以手工完成,制作技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毯技艺差异不大(图9-3)。从织造工具来看,主要的设备是地毯机(也称机梁、木梁等),常见的普通地毯机构造十分简单,十几根体积不同、大小不一的木材便能组装成一台,成本极低。另有割刀、铁耙、剪刀等功能不同的用具。割刀主要用于裁割毛线。“铁耙”的形状类似于体积大且多齿的镊子,用于夯实毛线。剪刀,按照所修剪花纹的不同分为平剪、花剪、凸花剪等3种。

地毯的原材料以羊毛为主,骆驼毛和其他动物毛也可用作原料。从国内的各种羊毛来看,品质上乘的为产于河南的“寒羊毛”,可以用于织造细密的地毯;次之的为产于北京地区以及山西、河北及石家庄地区的“秋毛”(秋季剪取的普通羔羊毛),为普通地毯常用。山羊毛也可以用于地毯的织造,但需要选用柔软整直的,否则不易染色、织造。骆驼毛具有柔软、细长、结实、易着色等优点,但它容易积土、弹性较差,且价格较高,因而较少被选用。⁴

从地毯制作工序⁵上看,大体可以分为整理原料、配染颜色、图样设计、织造4大步骤。

1. 据地毯传承大师康玉生口述,“活头活儿”即根据纹样的走向进行再加工。

2. 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及北京市三环以外全部地区。

3. “吉门派”之称,由当代北京地毯工艺传承艺人曹艳红告知。

4. 杨原:《中国近代地毯业》,7页,硕士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5. 同上书,8页。

前两大步骤可以视作对原材料的处理及再加工:首先,将羊毛去脂,清洗洁净,晒干。然后,将处理好的羊毛纺成毛线并按要求染成各种颜色,作地毯中的栽绒结扣线。而经线、纬线则必须以棉纱纺成,为纯白色。粗纬线则根据编织图案的不同配染不同颜色。这一时期地毯染色的方法主要包括3种:土法、新法和半新法。

“土法”,即用国产颜料靛青、藤黄、红染树、铜绿、烟煤、朱砂等,以中国本土手法进行染色。本土的染织方式是将毛线去脂除污后,投入染缸,取出梳理后便可用做地毯的原料。以“土法”染制的地毯在色泽上显得浑厚苍老,但织毯出口到欧美等地后需进行化学试剂洗涤,洗涤后的地毯颜色易褪,因此,“土法”染制的地毯在欧美地区的销售状况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很多地毯织造者纷纷选用西方传入的新的染色方法——“新法”,即采用近代工业的方式以西方化学颜料进行染色,这种方法易着色,且颜色鲜亮。但由于条件所限,国内很多工人未能完全掌握国外的染色技术,因而选择西方传入的新染料并应用本土染色技术进行染色,这种方法被称为“半新法”。但这种方法加工而成的地毯多呈现出“色不耐久,受潮即变”的弊病,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适用后,即被废止,而专用“土法”或“新法”染色。¹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在使用颜料方面也存在自身特色。宁夏地毯对新疆、内蒙、京津地区地毯的发展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宁夏地区的地毯染色惯用植物染料槐黄、靛蓝、橡壳驼、苏木红等并对天然毛色加以利用等。这种在用色上的局限,加之艺人长期的习惯,使所织地毯呈现出以蓝、黄、驼三色为基调,又间以紫红、白、黑等色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染色风格。这种地毯被外国的收藏家们称为“中国的黄、蓝毯”。² 20世纪京式地毯中以黄、蓝两色为主色调的制品与来自宁夏地毯的影响不无关联。

在图样设计方面,由于手工业者地位低下,相关记载中很少有关于纹样设计者名字的记录流传下来。地毯业使用的纹样主要来自于本土传承,包括我国边疆善于织造地毯的游牧民族地区,也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装饰纹样。北京、天津地区的地毯业发展起来后,也是在吸收、借鉴西北民间地毯工艺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自身的特色。³

地毯具体的编织工序⁴可分为上经、打底、画经、过经、栓头等。上经又称挂经,即将经线缠绕在织机“井式架”的两条横木上;打底,在经线下面将纬线与经线系紧,用“扒”扣牢,



图9-3 20世纪前叶正在修剪地毯的工人

1. 杨原:《中国近代地毯业》,7页,硕士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2. 李临潘:《近代京、津地毯图案的源流变化》,载《中国工艺美术》,9页,1982(2)。

3. 同上。

4. 杨原:《近代中国地毯业概况》,7页,硕士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图 9-4 波斯式地毯

使地毯底边坚固；画经，即将画稿按照 1:1 的比例放大后，将图样画到挂好的经线上；过经，即将结好的线结拉为两层，待经线依次编好后，在双层经线中间上压一条横纱线，用铁耙扣紧。横纱线压的越多，则地毯业中所统称的“道”数就越多，常见的有 70 道、80 道、90 道地毯。值得指出的是，地毯质量的高低、售价的多少便是以地毯“道”数的多少和所用毛线的质量为判断依据的。“道”数越多，则地毯的纬线越显细密，所用材料则越贵。所以，多道数的地毯费工、费时、费料，其售价要高于普通地毯。栓头又叫结扣，将毛线按照花样由左到右在经线上打成结；编织完成的地毯再经过平毯、开荒、洗毯、整修等美化步骤后，才能算正式完成。¹

因此，北京地毯因其复杂的制作工序、精湛的技艺、独具特色的装饰图案受到上层社会及国外消费者的喜爱，一度成为当时的奢侈品。据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记载，当时出现了不少地毯失窃案件，充分说明了当时地毯的贵重程度。



图 9-5 以梅、竹装饰的北京式地毯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地毯最常见的样式有 3 种：北京式、东方式、法国式（后来的美术式）。其中，北京式是最具传统特色的地毯样式。东方式的纹样主要源自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其中以具有鲜明的波斯传统艺术特征的纹样（图 9-4）最具代表性。法国式地毯具有欧洲地毯的装饰特点，其纹样是由法国商人带到中国的，在北京工厂加工为成品后返销法国。

在这三种地毯样式中，京式地毯的纹样题材、装饰形式最为丰富，其结构严谨、疏密有致，主体纹饰与辅助纹饰相得益彰。

1. 杨原：《近代中国地毯业概况》，7 页，硕士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京式地毯的很多图案是在明、清时期蒙、藏、甘、青及宁夏、新疆地毯¹图案演变的基础上,融合了内地织锦纹样并丰富了色相,形成了与边疆地区地毯相似而又有所区别的京式地毯新风貌。

20 世纪初叶,外国商人大批收购西北地毯,并于出口前在天津(主要的出口周转地)、北京进行复制。在复制过程中,这些地毯图案多由民间画师临摹或加以创作形成,因而,近代北京地毯图案既有西北民间地毯图案的粗犷与豪放,又吸收了刺绣、民间绘画的细腻、精巧²。

京式图案中,常见的装饰题材有龙、凤、虎、鹿、象等祥禽瑞兽,以及牡丹、莲花、菊花、松、竹、梅花等花木,云纹、回纹、万字纹等几何图案主要作为辅助纹饰(图 9-5)。主纹多为样式化的图案,由主花和宾花构成复合式纹样,也常见四方连续、散点式布局以及开光布局的装饰。还有采用绘画式装饰的,吸收传统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绘画形式。这类地毯装饰,相对于前一类样式化的图案更具有写实特征。要求纹样题材要蕴含美好寓意,纹样构成需循规蹈矩,讲究章法,疏密得当、动静相宜。由于羊毛地毯绝大多数为实用品,其本身材料很难经受时间的磨蚀,因而这一时期存世的地毯实物踪迹难觅,仅能通过十分有限的绘画作品及照片等资料来了解当时地毯的面貌。如民国二年(1913 年)元旦,詹天佑赠送给桂莘总长的照片上(图 9-6),可见散点布局的几何纹地毯,在深色地上由浅色菱方格与圆圈构成主体装饰,尽管无法确知詹天佑足下的地毯是否为“京毯”,但据此可以窥见当时地毯之一斑。

另据冯金茂的回忆,他在仁立地毯厂图画室学习画图期间,曾绘制大量的小样,其中便包括“京式、美术式、彩花式”等地毯样式,另有“佛像、仙人像”等挂毯纹样。其中的一幅“全国地图”挂毯曾代表我国参加了国际展览会,获得好评。³近年来,文物艺术品收藏、投资兴起,一部分 20 世纪上半叶销往海外的地毯及中国其他传统工艺美术品进入国际拍卖市场,从中可以寻觅到当初京、津地毯的面貌。尽管很难判断其中哪些是北京所产,但可以认定其中的不少地毯图案是在“京式”的基础上改造演化成的新样式,有的纹饰、题材、布局、设色融入外来元素。⁴

总体而言,北京地毯在 20 世纪上半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其在国际市场上知名度的日渐提升,北京地毯乃至整个中国地毯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其特点体现在:(1) 坚实且经久耐用。(2) 毯花剪法整齐,为土耳其、波斯地毯等所不及。(3) 地毯所选纹样多为中国传极富艺术趣味。

20 世纪上半叶,尽管随着西方影响的日渐深入,采



图 9-6 詹天佑旧照中的地毯

1. 所谓西北民间地毯,是泛指我国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北方内蒙的民间地毯。
2. 李临潘:《近代京、津地毯图案的源流变化》,载《中国工艺美术》,9 页,1982(2)。
3. 徐锋主编:《京工巧匠》,163 页,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5。
4. 石瑞雪:《20 世纪初(1900~1937 年)西方艺术对中国京畿地区传统手工艺装饰的影响——以织毯工艺为例》,硕士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